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共的涉台學術研究機構

Beijing's Research Institutes on Taiwan Affairs

doi:10.30390/ISC.199704_36(4).0003

問題與研究, 36(4), 1997

Issues & Studies, 36(4), 1997

作者/Author：蔡瑋(George W. Tsai)

頁數/Page：29-4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4_36\(4\).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4_36(4).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共的涉台學術研究機構

蔡 瑋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二所副研究員)

摘 要

本文係作者對中共對台政策研究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作者希望透過學術研究，和田野調查的方法，對中共的決策特色、對台政策的決策組織與過程，以及對台學術研究機構進行探討，發掘出重要的相關問題，以供學界及政府參考之用。

鑑於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已難回頭，在對台政策方面，中共領導人未來將更必須倚賴學術、研究單位所提供的政策諮詢建議，因此文章中的重點在於分析、介紹中共的重要涉台學術研究機構，並指出某些特別值得注意的研究單位。

文章中的某些研究機構並非專責從事台灣研究工作，但是由於單位屬性及隸屬關係等原因，其中部分研究人員間或仍會出所謂的「台灣問題」表達意見，提供上級參考，故一併列入觀查、討論對象，以求周全。

關鍵詞：涉台學術研究機構、組織架構、台灣研究、政策影響力

* * *

壹、前 言

自從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陸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轉眼之間已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不論台北喜歡與否，中共的綜合國力日漸增強，國際地位提高，人民經濟生活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一般說來，所有的海內外研究資料都一致指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的這種政策將會繼續發展下去，經濟恐會更有長足進展，北京應已無法重返類如文革時期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

這種不易、或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多半將使得意識形態對中共政治的影響力進一步降低，未來大陸社會恐將更形多元化、複雜化、制度化。由中央到地方，從國內到國外，中共當局所必須處理的國內問題，參與的國際事務將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只會複雜不會簡單。因此，一般判斷，專業知識的重要性將會更顯得重要，不管中共當局

願意與否，客觀事實的發展將使得中共學界及研究機構在未來的決策過程中必定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①

當然，除此而外，其他的客觀因素也將迫使中共朝此方向發展。早期的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多有戰功，富有個人魅力，他們可以將個人意志強加於其他同僚及官方體制之上。但是，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包括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喬石等人，由於未曾真正參加過所謂的「解放戰爭」，他們彼此之間立足點基本上是平等的，處於一個相互競爭的局面，而且他們多半是技術官僚出身，受過相對較好的正規教育，了解專業知識的重要性，因此尤其需要將自己執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植基於政策的正確性及共識建立的過程上。如此一來，學界及研究機構對中共未來政策的影響力勢必將增加。

還有就是，中共經過多年改革、開放，送出大批學者、學生赴海外深造，雖然有相當部分人士滯留海外未歸，（類如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返回大陸者又有相當部分因為官僚體制的原因未能發揮所學，但是這些年來中共畢竟也培養出一批受過相當學術訓練的青、中年學者。這些學者了解彼等對目前的政府政策影響力或屬有限，而且不易查證，對現階段的情況未必滿意，但基於客觀現實的發展方向，彼等對於未來仍有相當程度的期許。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稍假時日，彼等終將發揮作用。

簡單的說，毛、周、鄧等第一代領導人與其他的中共領袖是處於一個不對等的地位，但現代的中共領導人既無戰功，也無個人魅力，而且制度、社會的發展上也不允許他們再搞過分的個人崇拜，因此未來多半是在彼此妥協、競爭中求得一個相對穩定、平衡的局面。如果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定於一尊，以及缺乏平等的觀念列入考慮的話，鄧後大陸最可能出現的局面將是一段時期的相對集體領導，只不過其中有一個較為強勢、但不能為所欲為的領袖。中共目前所謂「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班子」的說法正足以反映這個傾向。^②

由於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已難逆轉，未來將會持續下去；由於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必須更為注重專業知識；由於大陸已培養出一批受過較佳的學術訓練的學者；由於制度化的發展，以及前述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合理預見，整體而言，中共的學者、研究機構未來可能有較大的機會能在一個（相對）較客觀、專業的環境中，對大陸的政策及民意形成增加其影響力。當然，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中共的對台政策在內。

稍早，筆者不但已經一般性的分析了中共的決策概念、模式，了解中共決策的一些本質、特色，也具體的探討了中共的對台決策組織、流程，確知中台辦、國台辦、

註①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3, 29~30.

註② 請參考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pp. xxvi~xxix, 及 Tai Ming Cheung, "The Impac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in the Post-Mao Period of Peking's Foreign Policy-Making,"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Vol. 23, No. 7 (July 1987), p. 96.

軍方，以及國安部都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具有極大的影響力。^③下面，筆者有意更進一步對大陸的可能涉台學術、研究機構加以介紹，希望能有助於我們對於相關問題的了解。

當然，對中共領導階層來說，所謂的台灣問題既不是一個單純的兩岸關係問題，也不是一個一般性的事務問題，而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問題，其中包括國際因素、國家未來發展、民族情感、地緣政治、主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國防、心理等各個層面的問題。雖說政治問題最後必須以政治的手段，由少數人以高層決策的方式加以解決，但中共中央仍然得依靠制度內外、各個業務單位、研究機構所提供的建言作為政策決擇的依據和考慮。

談到中共的研究機構，雖說有部分機構完全是以對台工作和研究為其重點，（如社科院台研所），但本文中的許多研究機構與台灣問題確實並無直接關係，其研究工作也並非完全針對台灣而來。舉例來說，即使是台北所熟知、重視的中共某些安全及軍方研究機構，如國安部、總政、總參所屬研究機構恐怕也並不是以台灣為主要、唯一的研究對象，尤其不見得每個部門，或每個研究人員都從事涉台研究，但其中確實有人可能基於研究工作的需要，而直接或間接對兩岸關係，戰略、戰術進行探討。換句話說，有些研究機構對台灣研究或許沒有直接關係，但間接關係則必不可免。

比方說，想研究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分析亞洲安全體系的發展、討論中共的國防戰略設計的中共學者，恐怕都不得不考慮到台灣因素；同樣的，大陸學者要了解中共的外交發展，以及其與國際組織間關係，也很難避免直接、間接觸及台灣與中共之間的糾葛。因此，下列的中共各個研究機構都很難避免的有某些業務或研究課題與台灣發生關聯。基於研究周全的考慮，筆者還是儘可能將多數間接涉及對台研究的相關機構都列入討論範疇，這是事先應該加以說明的。

貳、中共的相關涉台學術研究機構

基本上說來，雖說研究大陸的涉台學術單位相對比較不具敏感性，但中共的學術單位本質上仍屬官方所有，而且其中有許多涉台研究單位其實是屬於軍方及情治單位所掌控，事屬機密，中共學者在討論此一議題時仍有某種程度的保留。另外就是，有許多的基金會、研究會根本只是個空殼子，要人没人，要錢沒錢，大陸學者本身也搞不清楚。因此，本文所獲資訊除了訪談所得之外，有相當的資料仍得比對國內、外已有的文件資料加以反覆查證。

分析中共的涉台研究機構，我們可以分別由幾個不同的面向進行，可以由研究機構的性質（如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或政策導向的研究機構，是經濟、文化或政治性質的研究）、所屬地區（如北京、上海、南京或其他地區）、影響力的大小（如對中

註③ 請參考蔡璋，「中共的決策模式及行爲」，中共研究，台北，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及「中共對台政策的決策組織與過程」，大陸問題研究，台北，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即將出版。

共中央或對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歸屬（如屬於黨、政、軍，歸國安部，或軍方總政治部所轄）加以切入。結果雖然應該一樣，但是不同的方法恐怕還是各有各的長處及優缺點。

由於中國共產黨並無正式的研究機構（雖然中央書記處下有政策研究室及綜合研究室等單位，但畢竟只是業務單位，與正式掛牌的研究機構仍然有別），所以，下面我們將嘗試先由組織隸屬關係著手，分別由行政（國務院）系統、軍方單位、安全部門所屬研究機構，台研系統開始，再由中央逐漸向地方擴散。地區性機構及一般大學由於影響力有限，所以只在最後加以簡要說明。爲了避免重覆，減少篇幅，在中央所屬部會已經談過的地方性研究機構，在分區討論時就不再另行臚列。

初步調查研究結果顯示，中共國務院設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掛靠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直屬國務院，和各部會平行，掛名其下的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其實屬於國家安全部，國安部下另外設有「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關係學院」及政策研究室。中共外交部下轄有「外交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及政策研究室、綜合室等。台聯會則是中共統戰部的外圍組織，其下亦設有對台研究部門。

中共國務院所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兼政策協調的「口」，負責將下級送來的基本及研究資料轉往上級。根據美籍學者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早期研究，該所過去負責將來自情報（國安部）、研究單位（社科院）的意見傳達給上級領導，其協調功能類如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對政策影響潛力極大。^④我們有理由相信，該中心之所以重要恐怕與其前所長宦鄉及前總理趙紫陽有密切的關聯。

如果該中心確實一直是一個重要的體制內資料、政策傳達、協調「口」，而且扮演類如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角色，那麼該中心在過去直接、間接涉及台灣事務也不令人覺得意外。不過自從趙紫陽因六四事件去職，宦鄉去逝之後，該中心的分量、影響力已告逐漸降低，所以該中心在國務院內綜管所有研究單位的能力恐怕已大不如前。^⑤按照史溫（Michael D. Swaine）的講法，該中心已成空殼子，因此外交部、國安部所屬研究機構對台政策的研究意見恐怕未必會再向其彙報。

中共學者及西方專家都同意，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對台情報工作及戰略研究尤其著稱，^⑥因此國安部所屬研究機構，尤其是專門針對台灣的研究機構更特別值得留意，這其中又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台研所）爲其翹楚。台研所表面上是掛靠在社科院下，但實際上完全受國安部所掌控。據悉其所長還是國安部現職一級主管，但是爲了避人耳目，便於從事對台研究工作，赴台訪問研究及接待台灣到訪學者，

註④ David Shamba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Bureau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110 (June 1987), pp. 284 and 288.

註⑤ Michael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ublished by Rand Corporation in 1996, p. 61.

註⑥ *Ibid.*

該所特別設於北京海澱區頤和園附近。

台研所成立於一九八四年，是大陸最早成立的全國性研究台灣的機構，經費由中央專款補助，主要目的是要研究台灣的政情發展、人事、法律、經貿、社會等問題，提供政策意見供上級參考。該所並非單純的學術研究機構，而是一個以政策研究為導向的單位，類如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以及台北早期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目前所知，該所至少設有政治、經濟、文化、綜合、資料，及人物等研究室，另外還有港澳、文史組及一個辦公室。^⑦研職人員約一百五十人，該所出版**台灣研究**季刊，以及**台灣動態**周刊兩份刊物，但值得台北重視的恐怕是該所每週編印的內部機密性參考資料。

根據筆者訪談結果，台研所內部的對台意見多少有些出入，有些人態度極端強硬，認為台灣是個偏安江左的小朝廷，根本就應該加以摧毀，不承認中華民國持續存在的事實，有些人則相對較為和緩，較能夠理性探討問題，不過兩者之間並未形成路線鬥爭。台研所內部人事安排仍重論資排輩，這可由該所赴台訪問人選的決定即可看出端倪，但該所主要研究及出版論文已多出於年輕一代研究人員之手。對此現象，台北方面固然應該重視其上層領導幹部，但也應預擬因應之道，加強與該所年輕一輩有發展潛力研究人員往來，以了解及影響彼等的對台觀點。

根據台研所新任所長許世詮的說法，台研所的研究成果向上報給社科院本部，由其中一位專責副院長處理，再決定分別送給那些機構和單位的領導人，既可以送往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辦公廳的祕書局，也可以直接送給江澤民身邊的祕書，台研所本身並不過問，也無權過問。^⑧不過，如果研究的課題是由國台辦或書記處所委託，或是這些單位向台研所要求提供資料，台研所也會直接和這些單位打交道。台研所所擁有的台灣資料在大陸仍是首屈一指的。

另外，國安部所屬「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也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單位。該研究所原屬前中共中央調查部，表面上歸國務院所轄，是前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下級單位，但在人事、行政及經費方面極可能是歸國安部所管。另外，現代國關所又與中共「國家教育委員會」聯合兼管「國際關係學院」。現代國關所出版**現代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學院出版**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刊物，現代國關所研究人員可在國際關係學院兼課，而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生可以選擇性的進入台研、台辦系統服務。^⑨

一九九六年七、八月，筆者兩度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時

註⑦ 邵宗海，大陸「台灣研究」現況，張京育主編，**大陸地區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現況評估**（台北：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民國八十三年），頁六。

註⑧ 一九九七年一月筆者第三度前往大陸從事訪問研究，不過許所長所言應與事實有相當程度出入，其他曾在社科院服務過的研究人員多表示，台研所確係國安部所屬機構，其資料、研析意見仍以向國安部彙總為原則。

註⑨ 有關現代國關所的發展、機構請參閱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p. 288~291，國際關係學院到底屬教委或國安部仍然有不同說法。請參考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編，**The China Higher Education Directory**（香港：香港漢榮出版，一九八七年），頁四六，及平可夫，**外向型的中國軍隊**（台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五年），頁三一。

，中共有關人員曾經特別安排筆者與現代國關所資深研究人員交換意見。談話過程中，該研究員曾經表示，西方的研究有誤，現代國關所並不屬於國安部所轄，^⑩其實是掛靠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事辦）之下，但筆者對此說法持懷疑態度。另外，該研究人員多次提及，各國駐北京使、領館對現代國關所的見解頗有興趣，時常邀請該所人員見面，對某些雙方共同感到興趣的議題交換意見，美方學者到訪，多會與該所研究人員座談。不管現代國關所是否有專門從事對台研究及戰略規畫的單位，但該所的重要性不宜低估。

若就理論上說來，現代國關所和台研所既然均屬國安部管轄，兩者之間應該是有某種程度的分工，否則難免出現疊床架屋，職掌重疊的困擾，現代國關所應非專責台灣研究單位，但如果說該所的北美研究部門，以及從事國家安全研究的綜合單位若適時對台灣議題表達看法應該不令人意外。事實上，檢視一九九五到九六年之間的現代國際關係及國際問題研究兩份刊物即可發現，其中至少有五篇討論「中」美關係的文章都提及台灣因素。^⑪

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國安部所屬台研所是個關鍵性、檯面上的專責研究單位，重要性不容忽視，但現代國關所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幕後研究單位，同樣值得留意。筆者判斷，台研所及國安部的涉台情報業務單位可能對與台灣直接有關事務有較大的發言權，但也可能有其觀察盲點，只由台灣或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因此間或必須由現代國關所人員由國際政治、宏觀戰略的角度來加以補充，使最後代表國安部的意見更為周延。外界對該所的了解恐怕有繼續加強的必要。

因此，不論是由理論或實際的層面來看，台研所、現代國關所、國際關係學院和國安部的涉台情報業務單位之間一定有密切的橫向聯繫及內部溝通管道。他們彼此之間可以透過內部會議、座談、公文往返充分交換意見，形成共識，然後再以國安部名義向上、向外反映。目前所不知道的是，現代國關所對台灣議題掌握的程度、看法立場、對上級影響力的大小，以及究竟是那些人在專門、或間接從事對台工作的分析、研究罷了。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加以發掘。

中共外交部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是外交部的主要智庫（think tank），除了公開出版國際問題研究，以及通俗性的世界知識兩本刊物之外，還有僅供內部參考的機密性研究成果報告。公開發表刊物可以說是中共外交部的喉舌，反映中共對國際事務的準官方觀點，^⑫既然中共極力把所謂的台灣問題界定為內政問題，所以在這些公

註⑩ Michael Swaine *op. cit.*, p. 59.

註⑪ 呂其昌，「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幾點看法」，現代國際關係，一九九五年第九期，一九九五年九月，頁二～五。席來旺，「一九九五年中美關係回顧與展望」，現代國際關係，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六～九，一五。薛君度，「論中美關係：在柏林自由大學舉辦的講座上的談話」，現代國際關係，一九九六年第一期，一九九六年一月，頁四六～四七，五三。于曉輝，「戰後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與演變」，現代國際關係，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一九九六年六月，頁三三～三六。趙曉春，「『中國威脅論』對我國周邊環境的影響及有關對策」，國際關係學院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一九九五年二月，頁九～一三。

註⑫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p. 292～293.

開刊物避談台灣問題應該是可以理解的。研究結果發現，由一九九〇年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國際問題研究**這份刊物中果然沒有任何與台灣直接有關的文章。

不過，由於兩岸當前鬥爭焦點集中在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也就是務實外交方面，我們可以合理懷疑，中共外交部所屬「國際問題研究所」、或綜合研究室應會觸及與台灣有關的問題。不但可能對具體的問題（如李登輝總統訪美一事）提供應對意見，也可能從事長期的規畫，以防範、對抗、圍堵中華民國的外交作為，但是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應該都屬業務機密範疇。和其他的研究單位類似，「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也可以自行選擇研究題目，指定研究並非常態，該所會不定期的接受外交部指示，對特定問題提供意見。

筆者研判，中共外交部台辦是檯面上專門處理與台灣外交、外事有關的業務單位，負責擬訂、執行與台灣外交有關的鬥爭活動，偏向於實務、眼前的問題，「國際問題研究所」雖非專門針對台灣從事研究，但應是一個重要的幕後諮詢、研究、規畫單位，可能有部分研究人員專門負責分別由宏觀及微觀的層面進行研究、評估，並提出具體意見供外交部採決。因此，「國際問題研究所」、綜合研究室與外交部台辦之間應該也有密切、良好的溝通方式和管道。此一問題似乎值得進一步加以了解。

再談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表面上來看，該所人員、經費確實來自上海市政府，在行政上應受上海市政府管轄，但實際上外界均將其定位為外交部所屬機構。該所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同屬上海市政府的一級單位，和市府所屬的局、委、辦平階，所長為市府一級主管，可以對外招收學生，授予學位，出版僅供內部參考的**國際問題資料**。理論上，該所應為上海市政府服務，但是據其負責人表示，該所是「吃上海市政府的飯，但不盡然辦上海市政府的事」，連研究成果也未必一定要報給上海市政府知道。^⑬

事實上，上海國研所接受外交部的業務指導，其研究人員可以接受外交部委託，也可自行選擇研究題目，其特色是少作基礎研究，多作應用研究。有關兩岸關係的研究成果可送委託單位，也可分送各相關機構參考，地方性的資料送上海市政府，全國性的就送主管部會處理。該所目前正在作宏觀的規畫，研究在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等不同的領域裡，中共究竟要以什麼樣的面貌進入二十一世紀，如何處理其與相鄰的亞太國家間的關係等問題。

上海國研所負責人雖然謙虛的表示，外界多半高估了該所的影響力，但也承認，上級仍然相當重視該所的有關看法，該所意見確實可以直接報給中共中央參考。其實，若由歷史淵源的角度來看，由於汪道涵、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均出身上海，彼等重視上海國研所觀點並不令人意外。根據美籍學者沈大衛的研究指出，上海國研所人員和中共外交部及外交部所屬國研所人員每年在北京集會三到四次，交換觀點、相互學習，其研究人員的素質相當不錯。^⑭

註⑬ 一九九六年八月，訪談結果，此地所謂的研究成果多半應該指的是委託研究而言。

註⑭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 295.

可以引為佐證的是，前曾在美從事訪問研究的上海國研所前所長陳啓懋曾兩度由美來台訪問，在與台北學者座談的過程中，曾婉轉、間接的讓人感受到，該所、或其個人曾參與過對台灣參加國際活動，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東協論壇的政策規畫工作。渠個人對兩岸問題的發展頗為關心，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機過後，該所長曾再度來台訪問，並且表示會將有關訊息循適當管道如實轉達中共當局。上海國研所或該所個別的研究人員對台灣問題有所建言應該是合理的判斷。

談到中共軍方的研究單位，目前，外界對於到底是中共軍方或民間對國家安全、整體戰略的觀點、影響力較佔上風仍有不同看法。部分研究指出，非軍方的分量越來越重，但也有學者指出，軍方觀點較前更具影響力，兩種論點各有所據，均能言之成理。^{①⑤}但在涉台業務方面，筆者認為，並且同意某些大陸學者及西方分析家的看法，中共軍方恐怕扮演了重要，甚至是主導的力量。因此，中共軍方研究機構的對台觀點恐怕值得台北進一步了解。

關於中共軍方的研究機構，根據目前已有資料看來，總參有「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總政有「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友好聯絡促進會，^{①⑥}中共國防部下則設有北京國際戰略研究所（學會），台灣戰略研究室。^{①⑦}國際戰略基金研究會屬於中共（高等）軍事科學院，軍科院、國防大學又直屬中央軍委。當然，一如民間研究機構一樣，並非上述所有的機構都專門從事對台研究工作，但是其中有部分人員、機構直接、間接涉及台灣研究顯然是無可避免的。

按照中共以黨領政、黨指揮槍的傳統看來，中共中央軍委實際控制國防部及人民解放軍，所以中共中央軍委所轄機構應該遠較國防部所屬單位更值得重視。可以想見的是，中共軍方的台灣研究工作與非軍方的涉台研究有其重疊之處，但軍方可能更注重軍事、戰略、戰術及國家安全層面的探討。比如說，總參二部的重要工作在於評估世界各國的軍事部署，其重點在針對與中共有關的國家，以及東亞地區，所以總參二部如果涉及台灣事務應該不足為奇。^{①⑧}

就目前所知，中共國防大學的主要功能在於訓練、教學，培養軍方幹部，台灣研究應該並非其主要職能，但該大學的戰略研究所或多或少應該涉及對台的研究工作。

註①⑤ 這裡所說的民間只是一種相對於軍方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英文中所謂的 civilian。事實上中共的研究機構即使表面是民間性質，但實際上仍屬官方所有。有關不同論點請參閱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p. 285~286, 及 Michael Swaine, *op. cit.*, pp. 63~64.

註①⑥ 史言，「直昇機上的鄧三公主」，動向（香港）一九九六年五月號，總第一二九期，頁二一；魏邦立，「葉選寧和他的總政聯絡部」，前哨（香港）一九九六年九月號，總第六十八期，頁二二；平可夫，前揭書，第一章。

註①⑦ 多年來，國內學者多半未曾與北京國際戰略研究所人員有所接觸，該所是否與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待查；而台灣戰略研究室的說法僅見於香港爭鳴雜誌，筆者持懷疑態度，如果真有此一組織，多半應在總參或總政之下。見羅冰，「中共對台政策擬「鬆動」」，爭鳴（香港）一九九六年五月，總第二三期，頁九。

註①⑧ 有關總參、總政研究成果如何在軍方系統內彙整、上呈，請參閱 Michael Swaine, *op. cit.*, pp. 65~67。按照平可夫的說法，總參二部的第一局即實際負責台灣業務，平可夫，前揭書，頁七。

而總政的聯絡部、「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以及總參的「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都是重要單位。^⑩據台北了解，其中有些「學者」實際上是各該單位的重要部門主管，間或在大陸及台灣媒體發表文章，台北也曾同意部分人士以「學者」身分入境台灣，從事蹲點研究，與政府高層官員私下會面交換意見。台北對中共軍方（及情治單位）的對台政策影響力或許並非一無所知，只是苦於難以著力。

其實，這裡有兩個值得思考的相關問題。第一是中共軍方研究機構（含涉台研究）的素質及研究成果如何？第二則是軍方和非軍方研究台灣問題機構間的交流情形如何？過去的研究似乎顯示，除了少數的特殊情況之外，一般而言，中共軍方研究人員水平還是處於一個相對較差的情況，有關研究多半還是處於一種普通、模糊、概念的層次，人員的素質有待提昇，這自然影響了有關研究品質。^⑪中共自己人員也表示，軍方研究成果很少有原創性，多半仍是重申政府政策。這可能部分說明了中共軍方領導人為什麼對台灣的觀點還是相當僵硬的緣故。

關於中共軍方學者與外界接觸，相互學習，彼此影響的情形，所有的研究，以及筆者個人的訪談結果都顯示，中共上、下級之間的垂直、制度化領導有其模式、架構可循，但平行機關之間的關係最難了解，沒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可供依循。軍方和非軍方研究機構間的橫向制度化聯繫恐怕仍然有待加強，軍方學者與非軍方學者之間的交流多半仍然局限在非正式的座談會及個人關係層面。

結果，這就產生了至少兩種影響，一是兩者之間研究成果不易交流，導致資源的浪費；其次則是軍方觀點少受外界影響，因此難怪軍方對台立場表現得一貫強硬。其實，台北也有類似的困擾，軍、民學者交流同樣有待加強。如果，台北能夠尋得有效方法，最好是能主動與中共軍方及特種單位所屬研究機構、學者加強往來，其次則是鼓勵、影響彼等在大陸境內，加強與民間學界往來。以兩岸關係長期發展的眼光來看，這些都會有助於改善、調整彼等的對台觀點。

下面是另一個重要的「準」研究機構。中共全國台灣研究會（台研會）表面係屬民間組織，其成員來自各單位，均屬專職，和原單位已無正式關係。其上級歸口單位並不確定，至少設有聯絡部，研究部及資料服務部等幾個單位。該會祕書長為程思遠（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祕書長姜殿銘（社科院台研所前所長），副祕書長蕭敬，層級不低。該所雖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涉台研究機構，但個別人員仍從事研究工作。其主要功能恐怕是扮演一個「窗口」的角色，方便中共有關從事對台工作的人員與外界接觸。

除了全國台研會之外，中共在各省市地方也設有地方台研會，如上海台灣研究會即屬之。據中共人員表示，地方台研會的經費、人員來自地方政府，可以成為全國台

註⑩ 請參考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 298, 及 Michael Swaine, *op. cit.*, pp. 67~68, 但彼等只談到總政聯絡部與台港澳事務的關聯。

註⑪ Tai Ming Cheung, "Trend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Survival*, Vol. 29, No. 3 (May-June 1987), p. 246.

研會的團體或個人會員，彼此之間雖然沒有上、下級之間的隸屬的關係，但的確有業務上的往來。台研會所蒐集的有關涉台資料可依性質，以及重要性分別往上呈報給國台辦、國安部、總參或社科院，如果蒐集到極機密、或具有時效性的涉台情報、資料，甚至可直接報給國務院及中共中央辦公廳，甚至江澤民本人。

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以及各省的社會科學院當然並非以研究台灣問題為主，但是北京的社科院美國所由於研究「中」美外交問題，無可避免的最可能會觸及台灣議題。一九九六年七月，筆者曾於北京與該所所長、專職研究人員交換意見，討論過中國威脅論，大陸民族主義勢力興起，以及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等問題，彼等對於兩岸關係未來咸持悲觀看法，認為其間除了有民族主義的情緒之外，還有國家戰略利益的考慮。據表示，彼等可以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將有關對台意見傳達給中共領導當局。至於該所是否仍然出版限閱的**美國研究參考資料**則有待進一步了解。

大陸還有一些與台灣有關的研究機構，由社科院到大學到民間團體都有，如上海、廣東社科院的台灣研究中心；北大的台灣研究會、台灣文學研究中心、人大的台灣法律研究所、中山大學的港台文學研究室、廈門大學經濟系的台資研究小組；福建省台灣法律研究所、北京市的台灣經濟研究中心、上海市的台灣科技研究中心等等。^②其實，在這許多單位中，有部分只是個空殼子，有些研究範圍與政治無關，除了部分可能是情治單位的掩護機構外，多半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幾無任何影響力。

至於一般大學，西方及大陸學者多半同意，由於大學的重點工作在於教育，目的不在研究，而且大學教師既不易取得有價值的官方內部參考資料從事研究、分析，也缺乏良好的意見上呈管道，所以一般認為中共的大學對台灣問題少有影響力。^③不過，其中有幾個重點大學值得特別留意，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都有國際政治系或國關所，恐怕間或也會觸及台灣研究，而廈門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又設有台灣研究所，其中有些個別的學者對台灣問題的研究也有相當水平，這些都是應該注意的。

如果再就地區方面來看，中共的主要涉台研究機構多半集中在北京地區，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北京是中共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但是除此之外，上海也是一個應該重視的地方。除了前面提過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之外，上海另外兩個機構可能的影響力也不能忽視。其一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其二則是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所」。上海社科院與上海市台辦、市政府的各局、處平階，也都是市府的一級單位，亦可授學位。和平所名義上託給社科院督導，但享有相當的自主性，經費、人員均由上海市政府核配，在行政上歸市政府管轄，但工作上也並不只為上海市政府服務。

就像北京的學術研究機構一樣，上海研究單位的研究課題並不固定，可以主動，

註② 許光武，「大陸涉台研究機構對台政情研究比較——以廈大台研所與社科院台研所為例」，**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七四至七五。

註③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 285.

也可受委託對特定題目進行研究。由於歷史淵源、地緣經濟的關係，再加上江澤民、汪道涵出身上海，本身和上海學界有較好的關係，上海學界中的社科院、和平所、國研所及上海台研會這些機構就可以將資料透過適當管道直接送給汪道涵及江澤民等人，從而影響決策。汪道涵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主要負責反映上海觀點的這個事實，就可以說明上海學界對兩岸關係的潛在影響力不容低估。

至於中共從事對台研究工作人員的來源則是多管道的，過去中共採用用合一的計畫分配政策，但目前已可雙向選擇，機關，以及個人都有挑選對方的權利，不過體制內的專業研究機構用人仍相當謹慎，黨性、安全仍是重要考慮。以社科院台研所為例，其人員就多來自統戰部、外聯部及國台辦等單位，台研會人員則是分別由各個單位分配、抽調、轉調、互換而來。至於一般的大學台研所，除了廈大之外，多半屬於兼職，有些涉台研究機構根本是自發性產生的，其工作、研究人員是由歷史、文學、哲學部門轉業而來。

在結束本節之前，筆者可以引用一份國內另一學者的訪談研究成果，以證實前述學術研究機構對於中共的對台政策應有某種程度的影響。該研究報告指出，中共對台工作小組成員各有重要智囊機構，舉例來說，江澤民所仰賴的主要智庫包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錢其琛則依靠外交學院，賈春旺靠的是國安部所屬研究機構；熊光楷則多半利用軍方的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學會；王兆國運用政務、黨務系統的統戰部及國台辦所屬研究機構；汪道涵多半使用上海社科院亞太所、上海台研會等單位。^③

這裡所提到的北京現代國關所、和平發展中心、軍科院、戰略所、戰略學會、上海社科院、國研所、和平所都在筆者的分析、敘述範圍之內。學者之間以不同的方式，透過相異的管道，以及東、西方資料的研究居然可以得到幾乎相同的結論，其中應該既說明了一些問題，可能也和事實相去不遠，至少也達成相互印證的作用。有關論述值得台北重視。

叁、影響決策的方式

至於中共研究機構影響決策的可能方式，一般說來有正式及非正式兩種，也就是制度內或制度外之別。正式的方法是接受所屬部會、或其他上級機關的指定、委託，或自行就某專業問題（如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意涵、影響及對「中」美關係可能造成的衝擊等等），主動、或被動提出報告，也可能以組成工作小組的方式，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然後透過所屬機構往上呈報，還有就是參加有關部會內部會議，接受諮詢，提供意見，形成共識後由主管部會彙整上呈。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人員表示，原則上，各研究機構所有的上呈研究報告首先要經

註③ 楊開煌，「中共軍方在對台政策中的角色分析」，展望公元二千年兩岸軍力平衡學術研討會論文，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岡山空軍軍官學校。

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由其評估、摘要，分發，只有極少部分資料、要報能夠以非正式的管道，完全避開中央辦公廳，直接送給中共最高領導。^②這種說法或許和事實相去不遠，但也可能是本位主義作祟，有意提高中央辦公廳的職權，細節仍然值得進一步加以澄清、分類。至少就筆者所知，許多委託研究資料就未必一定經由體制內由中央辦公廳往上呈報，而是直接送給相關領導，再在高層會議中提出討論。

所謂非正式的方式則是透過個人的身分及關係，與相關研究人員，或主管部會官員非正式的交換意見，提供簡報說明，或參加學會，以及學術研討會，間接影響彼此觀點，或以非體制內的方式撰寫報告直接上呈最高領導人參考。就筆者個人觀察所得，中共各研究單位的正式報告、研究成果固然應該留意，但非正式的交換意見，內部會議，彼此影響不容低估。事實上，前述部分研究單位既非專業的對台灣研究機構，也未必對整體台灣問題很有影響力，但是由於其負責人的關係，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向上反映，反而對某些特定的議題很能發生影響。^③

舉例來說，許多中共研究人員身兼數種不同身分，如上海國研所陳啓懋，社科院台研所許世詮都是例子，彼等既是各該所的前任、現任負責人，但也與全國台研會、海協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是既可以透過本身機構表達意見，也可以透過海協、台研系統交換看法，都能影響彼此及上級觀點。另外，筆者在大陸田野調查時，與社科院美國所有關研究人員私下會面時，不但有其他機構人士參加，甚至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人員到場「學習」。凡此都可證實，大陸學者間非正式的集會並非少見，如果說因此而間接對上級、下級及同儕發生影響力也不特別令人感到意外。

最後，再談到影響力大小的問題，影響力可以分體制內、體制外，中央和地方，以及單位性質等幾種不同的方式來表示。一般說來，黨、政、軍方、安全機構等體制內的研究機構對中共決策影響力相對較大，這當然與彼等身為國家統治機器有關，成員對制度的忠誠度較高，而且有制度化的管道、機制可以循制度向上反映意見，表達觀點，從而影響決策。

談到地方問題，中央較地方對決策的影響力為大，北京、上海當然較其他地區有效。北京相關機構對政治事務更為關心，也較有影響力，而相對說來，上海則對經濟方面事務更為關注，發言權可能也相對較受重視。專門的涉台研究機構，如台研所，台研會當然重要，其意見對於中共決策應有相當的分量，但由於研究相關國家，如日本、美國、國家安全問題而觸及台灣議題的某些特種研究機構也應加以注意。

總而言之，軍方和安全單位所屬涉台研究機構是最內層的核心單位，國安部的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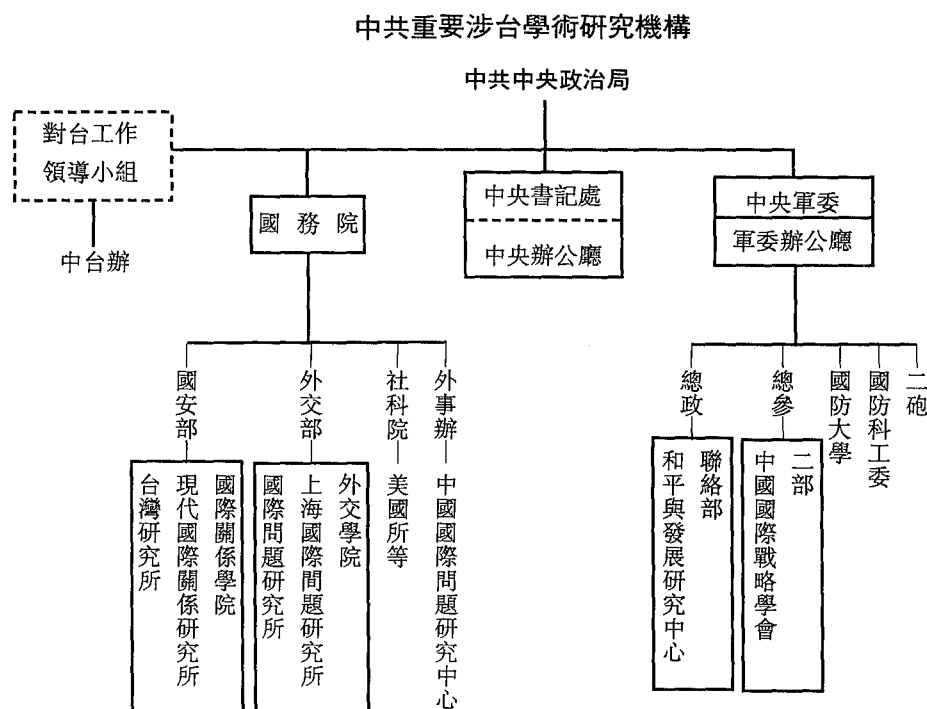
註② 此一說法與史溫的研究結果相符，見 Michael Swaine, *op. cit.*, pp. 62-63.

註③ 雖然所有的研究都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推行，中共決策有相對制度化及專業化的傾向，這將使得關係的作用減低，但關係仍將扮演重要的因素，關係是一個溝通及發揮影響的工具，可以左右研究機構的角色。關係可以分為領導關係、行政關係，以及業務關係，垂直的稱為條條關係，水平的則是塊塊關係。有關「關係」的學問可參考，鄭斥琰、文灼非主編，*中國關係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九九六年）；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1-34; David Shambaugh, *op. cit.*, p. 280.

研所、總政的「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總參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戰略學會」不可掉以輕心。外交部及國務院系統的研究單位屬於中間階層，對實務的發言權不小。另外上海社科院、和平所、全國台灣研究會、以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的國政系、國關所、各大學台灣研究所（如廈大、浙大、南開等）的學者專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至於個別的大學已屬於外圍中的外圍。

如果，我們以前述分析為指標，循線找出其中部分研究單位的重要幹部，那麼至少在政治事務方面，刑魁山、蕭敬、姜殿銘、余克禮、潘振強、郭隆隆、陳佩堯、章念馳、王緝思、劉文隆、李家泉、辛旗、陳啓懋、王在希、陳孔立、范希洲、周建明、黃嘉樹、劉國深、李強、楊潔勉、李義虎、賈春曉等人或許都可列入考慮、觀察的名單，值得留意。不過，在中共的體制之內，這些學者、專家多半也只是扮演螺絲釘的角色，他們自己也不敢、無法評估到底對政策有多大的影響力。

下面是中共方面可能直接、間接從事涉台研究，較為重要機構的圖表：



其他：各部會有綜合研究、政策研究室。

上海有和平與發展研究所及上海社科院。

一般大學，如北大、南開、人大、廈大、浙大及個別學者，可循正式、非正式管道，由所部會、上海市，個人管道，或國家教委上呈。

就目前觀察所得，大陸各研究機構有關台灣的資訊來源，公開的部分多半來自台灣的報章雜誌、書籍、電子、廣播媒體、台灣各界赴大陸參訪時所表達的觀點，以及大陸學者來台訪問、研究的心得。彼等所仰賴的非公開資料外界自難得知，但恐怕多

半來自各該機構、或相關單位所屬業務單位所提供。台北方面曾有學者嘗試以量化的方式分析大陸研究機構出版與台灣有關文章內容，這確實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⑤有其參考價值，不過真正影響中共對台決策的關鍵性意見及觀點恐怕都只有在內部報告中才能發現。

將來，爲了進一步檢驗前述各研究機構是否直接、間接涉及台灣研究，對中共對台決策影響的程度，筆者以爲，台灣不但應該分門別類，由各單位出版的公開涉台研究刊物中加以探討，與這些研究機構加強往來，也可嘗試在安全無虞，不涉及情報蒐集的前提下，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以雙邊學術合作的研究方法，透過議題設定及建立科學型模的方式來適度了解這些機構的真實觀點、影響能力，而不只是文字資料、邏輯上的推理分析，或許會更有價值及說服力，不過這都有待未來進一步的努力了。

肆、結 論

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對外活動的更見積極，以及新一代領導人的產生，未來大陸的決策將會有逐漸制度化的傾向。和以前比較起來，中共領導人未來將更需要倚賴學術研究機構的政策建議，這將是一個很難避免的結果。如果前述情況維持不變，多數大陸、西方及國內學者都合理預見，中共研究機構、台研單位的研究結果將對中共的對台政策更具影響力，而且此一情況將會持續增強。

中共國務院、國安部、外交部、社科院、軍方所屬研究機構都可以主動、或被動就職掌內的一般涉台業務撰寫研究、分析報告，也可以針對特殊的議題撰寫專報、要報，可以透過所屬單位，在體制內彙整之後，分別經由國台辦、中台辦、中央辦公廳、書記處及中央軍委辦公廳等不同管道，但也可以透過私人關係向上呈報，最後上達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最後的政策抉擇。其中有相當程度的靈活性，並非一成不變。

黨沒有專責的掛牌研究機構，行政機關業務單位（如外交部、交通部、外經部、新華社）所轄綜合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有其分量，但只對內部負責，有關見解及影響力無從查證。所有研究結果都指向，在中央方面，國安部、軍方、外交部所屬專責研究機構最具重要性，屬於重要機構，因此台研所、現代國關所、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全國台研會特別值得留意。在地方及一般大學方面，上海的社科院、和平所，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的國政系、國關所、台研所也有一定的分量。

談到影響力一事，地緣及機關和個人的因素都該同時列入考慮。北京、上海兩地明顯較其他地區佔有地理上的優勢，專門（專業）的涉台研究機構，體制內的研究機關，政策（政治）爲導向的研究單位都較其他一般研究機構或大學更具影響力。不過所謂的內圍、外圍、影響力的大小是變動的，會隨著機構組織的調整、人事的異動而

註⑤ 許光武，前引文，及邵宗海，前引文。

有變化，不可僵硬的處理、對待。

對台北來說，既然兩岸統一將是一個長遠的政治工程，當前實在欠缺主、客觀環境，在可預見的將來並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台北尤其要有一個長期的戰略規畫，與短期的戰術作為。如果說中共軍方及安全單位的研究機構對其政策影響力較大，台北是否應該考慮如何加強與其溝通？如果說中共軍民學者交流太少，因此導致其對台政策的認知偏差，台北是否可以適度影響此一現象？如果說中共研究機構對其未來政策的影響力仍將加重，台北能否考慮積極加強兩岸學術往來？

舉例來說，筆者訪談結果獲知，中共台研、軍方、外交、經貿系統內部確實有些人對台態度、立場相對較為溫和、理性，其中尤其以南方、有海外經驗、年輕受過正統學術訓練、曾經到過台灣的人特別明顯。彼等雖然不敢、無法避開中共的宏觀控制，公開言論及研究成果仍然必須為政治服務，基本上也支持中共的對台政策，但是彼等觀點還是可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避免中共的對台政策趨向極端，或是令強硬派掌控全局。

未來，隨著時間的變化，年齡、經驗、知識的成長，年輕一輩終將位居要津，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可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力，既然兩岸僵局恐將持續一段時日，當前雙方既不可能打仗，也不具備統一的客觀條件，在此情況之下，台北更不妨將目光放遠、放大，由長遠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主動、積極的發掘大陸年輕、有發展潛力的涉台研究學者，進行接觸、溝通。即或投資失敗，台北所受損害也相當有限，如果其中有五分之一學者能對台灣現況持較為友善、理性的了解態度，台灣就算大有收穫。事實上，台北可做、能做、應做之事不少。

另外，台北也可以透過學術研究的方式，進一步查明前述各該研究機構的出版刊物、人員數目、研究主題，對彼等的對台觀點加以分析、研究，這將有助於台北對各該機構的了解。以筆者所接觸過的中共學者，不管於公、於私，多半都有興趣來台訪問，或進行短期蹲點研究，不少人也願意和台北學者從事合作研究，如果台灣方面沒有重要的安全顧慮，經費不是主要的困擾，台北不妨趁此機會廣伸觸角，積極和大陸的主要軍方、民間研究機構及重點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而且合作的關係可以不僅侷限在政治、政策研究方面，甚至可以擴及經濟、貿易、貨幣、交通、農業等不同的層面，以廣結善緣，增加彼等對台灣的了解，從而間接、長期影響中共決策。

*

*

*

